

人生晚景的微光

□潘飞

如硕大的鲸鱼死后，尸体沉入海底，分解物可以供养其他生物长达百年，形成深海生命的“绿洲”，每一个父亲，终有一天也会告别人世，但他的相貌、智慧、才华和人生阅历，都会在孩子们身上实现浪漫的复制和重生。对于任何一个女儿来说，面对老子的颓然老去甚至溘然离去，都是人间最残忍又最壮烈的事情之一。对于《阿爸，咱们去看萤火虫：照护失能父亲三十年》（以下简称《萤火虫》）一书的作者季先来说，这种感受可能越发深刻。

因强大的基因，女儿如父者众——无论是外貌，还是心性，父女常常可以互为“镜中人”。所以，世界上再没有任何一个人比女儿更适合去扫描父亲。然而，五十多岁即脑中风、已失能三十年的老父，多年不能言，只能支支吾吾地回应他人。父女间的对话，也就剩下了带着体温的拥抱、带着轻抚的文字。哪怕生活艰难，甚至病中糊涂，作为文学爱好者的季先老父都不忘出书并叮嘱几个儿女出书。因此，《萤火虫》一书的意义在于，这是季先对其父亲“鲸落”的回报和反哺——少年时，父亲教她读书写文，时至中年，她终于用当年父亲传授给她的好文笔，遵从父命，沿袭父爱，回报他。

“阿爸，咱们去看萤火虫：照护失能父亲三十年”模拟了以豢养萤火虫为工作、独自照顾双亲的季先

三哥，不得不在晚间工作带着父母出门时内心的默念，这何尝不是季先内心对滋养她的父亲、乡土、生命的深情呼唤呢？在她眼里，“萤火虫”如老父亲当年赋予她乐观面对苦难的勇气，能帮助她去抵御绝望，是植育希望的亮光。从封面到文字，《萤火虫》都富有四川西部寻常人家独特的烟火气——既有熏眼的泥烟，更有感人的饭菜香。季先把父亲在川西平乐沉浮悲欢的一生，写成了史诗，她对父亲的爱这首散文诗，在庞大的组诗中，自带光芒。

八十多岁的父亲完全失言、失智、失能，曾经鲜活闪亮的生命被岁月击得丢盔弃甲，三哥独自一人照料双亲，常常被突发的种种事故催促得兵荒马乱。很明显，在生活这个“战场”上，这对父子兵，都有极强的毅力，要“战斗”到流光最后一滴血，让观战者都不寒而栗、肃然起敬，这是《萤火虫》写得最凌厉激越也让人最不忍卒读的地方。但季先并不甘于流落、打滚于鸡零狗碎中哭爹喊娘、卖惨求荣，而是通过对失能老人不断与衰老抗争、与生命赛跑，三哥对年迈父母多年如一日的孝道的叙述，再次引导我们触及如何优雅变老这一终极命题。老父亲可能在穷日子里突然变戏法般地掏出一根冰棍，抑或在暴风雨的夜里出现在校门口……

季先用川西人特有的乐观和奔放，写出这种多层次、转折性的丰沛质感。三哥会在艰巨的照料双亲的生活之余，对着爸妈拉手风琴，唱着父子俩共同喜欢的歌曲，老父亲在一旁像小婴儿一样，咿呀乱舞……书中这样的场景，如封面暗色丛林里星星点点的萤火一样，在残酷的生活底色上发散出灵魂的亮色和明光。这个家庭的每一个成员，都过得沉重，但他们依然无比热爱生活，这种大无畏的精神，这种强烈的反差，让人感动。

一鲸落，万物生。季先等万千儿女，恰好是这“万物”之中的一粒微尘。写作，终究是一种回溯。通过《萤火虫》，季先重回生她养她的川西夹关镇，钻回父亲浓厚的怀抱中，前往灵魂的原乡，旧地重游。好的文字有魔法，她似乎让时光回转、父爱不朽。

如何认识战后日本的鲁迅论

□赵京华

鲁迅与日本渊源深厚，这不仅是指他有六年之久的留日经历且这段经历深刻影响了其思想的定型和文学理念的生成，包括后来他与日本各界种种或深或浅的交往关系，还意味着日本人对这位特异的中国文人有着长期持续的关注，并在特定的时期里使其成为本国思想论坛的一个焦点，从而激发了几代知识者的观念想象力。就是说，“鲁迅与日本”这一议题是个双向流动的关系结构，包含着鲁迅生前对日本的深深介入和死后日本人对他的诚挚接受。这本身构成了一个不同民族间跨文化交流与互鉴的典型案例，其传播的外在条件和接受的内在因都值得关注。在我看来，这同时也映现出一段中日思想文化间特殊的东亚同时代史，它对于我们重新认识鲁迅及中国革命的20世纪史，以及战后日本的思想历程，同样重要。

这里，所谓“特定的时期”指1946年至1976年的三十年间，即日本社会激烈动荡的“战后民主主义”时期。1945年决定性的战败造成了深刻的历史断裂，日本人从帝国土崩瓦解的废墟上猛醒过来，在反思自身走向殖民侵略战争的近代史的同时，开始谋求民族、国家的复兴和基于个体独立的民主社会之重建。这是一个凤凰涅槃式的“第三次开国”（丸山真男）的时刻，几代日本知识者带着切肤之痛重新思考明治维新以来的现代化进程，在此，他们注意到长期被忽视甚至蔑视的另一个思想资源，即经过反抗殖民压迫和艰苦卓绝的社会革命而实现了民族解放及另类现代化的中国，发现了其精神代表——鲁迅。

在上述“特定”的三十年时间里，鲁迅不但是学院里的科学对象，更是思想论坛中的一个焦点乃至特别的精神标尺。日本知识界将鲁迅推到由思想、文学、历史等问题构成的思考场域的中心。近代以来日本知识者所遇到的种种思想难关，通过对鲁迅的阅读和阐发而得到深度思考，鲁迅及革命中国成为战后日本思想界价值判断的一个重要标尺，有力地改变了明治维新以来一切“以西洋文明为标准”（福泽谕吉）的思考惯性。鲁迅深深嵌入当代日本的内部，成为内在化于战后思想史的“他者”。

“二战”后日本知识界自觉不自觉地形成了一个鲁迅逝世逢十纪念的传统。首先，1946年思想家竹内好发出第一声纪

诞生于中国的作家鲁迅在1936年与世长辞之后，却于异域日本获得了新的思想生命，日本知识界自觉不自觉地形成了一个鲁迅逝世逢十纪念的传统。这种特殊的跨文化传播现象引起鲁迅研究学者赵京华的思考，《活在日本的鲁迅》一书从日本学院里的鲁迅研究传统入手，阐述了鲁迅如何深深嵌入当代日本的内部，成为内在化于战后思想史的“他者”。



《活在日本的鲁迅》
赵京华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念——《关于鲁迅的死》，并通过后续文章《民族主义与社会革命》等将民族独立和主体建构的问题推向思想界，而历史学家石母田正《关于母亲的信——致鲁迅与徐南麟》则进一步把被压迫民族的问题引入研究，由此提出重构日本史的亚洲视角。其次，1956年文学家中野重治《某一侧面》及其前后的纪念文章，对如何在贯穿日本近代文学史的“政治与文学”关系论争结构中讨论鲁迅文学的人性基调和高度政治性特征提出自己的看法；而文化评论家竹内芳郎又将“政治与文学”关系转换成“革命与文学”问题而使讨论得以深化。第三，1966年正处在全球爆发反越战抗议、社

会政治运动达到高潮而“68年革命”即学生造反运动山雨欲来之际，由引领战后民主主义文学的新日本文学会主办的“鲁迅与当代”系列讲演，将思考带入个人与社会、传统与现代等当代世界面临的重大问题中来；戏剧家花田清辉则将这些议题转换成文学的现代与“超现代”（反现代或后现代）问题，用荒诞派手法成功改编《故事新编》而对鲁迅文学提出了独特阐释。第四，1976年，随着日本大众消费社会的到来和激进政治季节的结束，思想论坛上内涵丰富的鲁迅论也迎来落幕时刻，新锐出版机构青土社的杂志《Eureka诗与批评》推出名为“鲁迅：东洋思维的复权”的大型特辑，在中日文学同时代的总题目下展开讨论，这仿佛是战后民主主义时代“落幕”前一个意味深长的纪念。

对于一位当代的外国作家要逢十纪念，的确是一个罕见的事态。这或许就是日本知识者在战后将鲁迅推向思想论坛中心的方式之一。因此在这里，我将以上述战后三十年间思想论坛上被言说的鲁迅为观察对象，通过整理和辨析逢十纪念的日本各领域知识者的相关论述，尽力挖掘其问题意识背后的思想史脉络及其前后的逻辑关联，以复原活跃于战后日本思想论坛中的那个鲁迅。当然，这些纪念活动并不能反映战后日本人对鲁迅思考的全部，也不是日本知识者将鲁迅推向思想论坛中心的唯一方式，但这个系列纪念活动还是能够大致呈现社会变迁导致的思想主题和问题意识的演进路线。例如，从反省战争的失败到谋求民族主体的重建，上世纪50年代的思想议题主要集中在民族独立和国家再造上面；反对《日美安保条约》的斗争和大规模社会抗议运动的兴起，导致国家民族问题开始转向社会建构，与市民社会紧密关联的个人与集团、知识者与大众等关系问题成为上世纪60年代的思考焦点；上世纪70年代前期，人们猛然发现社会已然跨入大众消费时代，传统与现代、自我与他者、中日文学同时代性等开始再次受到关注。至于那个挥之不去的“政治与文学”关系的论争，则是贯穿战后日本三十年始终的基本母题，从思想的深层连接起民族国家、个体社会、传统现代、存在虚无等彼此交错的思考链条。而在这个日本战后思想主题的系列演进中，有中国作家鲁迅的深深介入。

乡村精神血脉的指向与重生

□安正辉

在作家笔下，每个村庄都有着独一无二的地缘特点和个性品质，或内蕴平和柔美，或民风彪悍粗犷，无论哪种情形，都是区别于其他村庄的主要标识之一。在众多描写乡村生活的作品中，刘亮程的《一个人的村庄》、梁鸿的《中国在梁庄》等在社会上产生过强烈反响。这些作品饱含深厚的乡土文化和浓郁的生活气息，以纪实手法记录村庄里的人物事迹，为读者呈现出一个完整真实且千姿百态的乡村世界。同样以真人真事为素材的《回乡记》，详尽叙述与村庄有关的寻常故事，让读者通过村民的凡俗生活和人生境遇，切身感受村庄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沉浮起落和革新蜕变。

江子的《回乡记》是一部探寻故乡与他乡、出走与回归的精神之书，也是一部在日益加快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如何融入繁华世界、探寻生活方向的心灵之书。江子的关注点没有离开自己的故乡——江西省吉安市吉水县枫江镇下陇洲村。眼光始终聚焦于村子里的人和事——祖父、老姑婆、伯父、父母亲、姐姐、妹妹、弟弟以及其他相熟或听闻过的人。这些人出生在下陇洲村，成长在下陇洲村，甚至有些人一辈子也没有离开下陇洲村。对于辽阔的大地和无边的世界来说，他们如同落在大海里的一滴水珠，没有多少人知道他们的存在，除了他们生活的下陇洲村。

祖父受当地民风的影响，对武术有着近乎痴迷的执著和坚持，他想尽一切办法教自己的孙子习武强身健体，试图用练武这一方式让家族在繁衍生息中开枝散叶。曾经读完四年制中专学校的伯父，却因大



《回乡记》
江子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祖父的固执放弃在县城的发展，回到下陇洲村成为一名地地道道的农民。打工者带着多年的积蓄回到村里修建新房，是村庄每年都在上演的压轴大戏，当这种大戏成为衣锦还乡的象征时，拼搏奋斗多年的功成名就者、已在县城购置了房产的亲人，也都在老家重新翻建房子，连在县城居住多年的父亲也动员儿子参与到回乡建房的热潮中。

在村子里面，离开家乡和重回家乡是两种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在不同年龄段的表现，一如诗人席慕蓉在诗歌《七里香》中所写的那样：“溪水急着要流向海洋 / 浪潮却渴望重回土地。”老年人把自己的一生都深耕在土地之中，他们大都习惯

与鸡鸣犬吠和庄稼草木为伴的简单日子，他们到城市生活多处于被动，或帮助子女看护小孩，或因农村不具备严格意义上的养老条件而入城。他们身在城市，心灵却与城市脱节，甚至与城市节奏背道而驰。往往，落叶归根的传统意识在他们的思想深处不时跃动，回归田园的永恒观念让他们无法心意平和。在城市生活数年后，他们又会重新踏上通往农村的道路，这既是对农村生活的最高致敬，更是对故乡大地的最终皈依。

年轻人通过各种途径实现着远离农村的理想，或外出打工，或举家迁移，在寻求美好明天和未来的征途上义无反顾勇往直前。当越来越多的新一代农民择别故土扎根城市，以开拓广阔疆域的气概融入人潮汹涌的都市生活时，村庄却没有因为他所生养的人的逐渐离去而形单影只，因为每个村庄还有不少村民依然坚守着自己与土地的盟约。他们是村庄的组成部分，更是村庄的内在核心，他们与村庄血脉相连，与村庄互为依存，他们用自己的守护完成对村庄的精神回报。只是当无数村民把离开农村作为一生最大的变革行动时，农村还能为自己日渐空洞的生活注入怎样的强心剂？可以说，奔赴他乡与回归故乡的矛盾冲突，既是江子对当下农村现状的深刻思考，更是乡村发展史上一个永恒的时代课题。



扫码下载齐鲁壹点
找记者 上壹点

编辑：曲鹏 美编：陈明丽